

劳动者返岗点对点 健康信息也应点对点

3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有关工作举行发布会。针对乘坐“点对点”专列或包车返岗的务工人员是否需要隔离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表示,按照五部门通知要求,乘坐“点对点”专列或包车返岗的农民工,只要行前14天内和在途没有相关症状的要尽快复工,不需要再进行隔离。

在大量农民工返岗、企业复工复产渐入高潮之际,五部门的这个通知给疫情防控指明了具体的方向,也化解了很多劳动者的困惑和不便,有助于降低防控成本、提升复工复产的效率。

前段时间,很多劳动者返岗,往往要经历

居住地和务工地的“两头隔离”。在此前疫情处于中高位运行的阶段,劳动者居住地和务工地分别按照谨慎严格原则在返岗的出口和入口进行健康观察乃至隔离,符合当时的防控形势。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是自行选择交通方式返岗,这样在返岗途中,劳动者接触的人员比较复杂,也有一定的病毒感染风险,劳动者在居住地的健康信息就不一定能够代表其到达务工地后的健康状况。为此,务工地为控制疫情扩散风险,对返岗劳动者再进行隔离观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已呈现出明显向好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我们仍然要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但现阶段,我们应采

取与疫情形势相对应的防控措施,精准防控,把劲用到该用的环节,该严的一定要严,该简化的也一定要简化。

农民工等劳动者坐企业或地方政府的“包车”从居住地到务工地点点对点返岗,在途中接触的人员构成相对简单,来源去向明确,且相关方会在车辆上进行必要的健康监测管理,如此,劳动者在“包车”上感染的风险就微乎其微。如果劳动者返岗前在居住地就已经进行了14天或更长时间的观察,没有新冠肺炎症状,在途中也没有相关症状,那么,务工地完全可以凭借上述信息对劳动者进行健康确认,没必要再要求劳动者进行隔离。对于点对点包车返岗的劳动者而言,两头隔离、重复

隔离就属于多余动作,徒增防控压力,加重防控负担,浪费防控资源,浪费劳动力资源,给劳动者带来了不便,更影响复工复产的效率。

据统计,目前各地返岗复工的农民工已达到7800万人,这一数字只占今年春节返乡农民工数量的60%,返岗劳动者数量还将呈现不断上升之势。如果这些劳动者都“两头隔离”,势必会将复工复产的节奏拖慢多拍。

劳动者返岗点对点,健康信息也应点对点。点对点返岗的务工人员避免无谓的“两头隔离”是精准防控应有之义,各地各用人单位应该准确评估疫情防控形势,准确理解执行五部门的有关要求,从细节抓起,把不重复隔离落到实处。
(李英锋)

一家之言

“公筷公勺摆上桌,分餐进食好处多。”日前,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发出一系列文明生活倡议,其中包括推广使用公筷公勺、分餐进食等倡议。同在一座城,共爱一个家,疫情当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守护平安的良药良方,有关倡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认同。

中国人的饮食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很长时间以来,围桌共食已成为普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符号。筷子是传统饮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符号,逢年过节亲朋好友聚会,许多人都习惯以彼此夹菜的方式表达情感。围桌共食中来回“穿梭”着筷子,这种场景虽然传递着情谊,但却极大地增加了病菌传播的风险。

早在2003年非典暴发期间,钟南山院士就呼吁过使用公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钟南山院士再次强调使用公筷及家庭卫生消毒的重要性。调查发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感染者是通过聚餐或密切接触感染,感染人群往往是整个家庭、整个家族或聚

让公筷公勺分餐进食成为文明标配

集朋友群,共餐、合餐等传统进餐饮食习惯是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重要推手。

使用公筷公勺、分餐进食,这些安全用餐举措不是小事,而是降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围桌共食、不用公筷的就餐方式,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便捷途径,对人民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围桌共食这种看似亲密无间的饮食方式,在平时也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幽门螺旋杆菌、流感病毒、乙肝病毒、手足口病等,都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交叉感染。研究表明,家庭中如有乙肝病毒携带者,合餐导致的感染率高达42%,而分餐的感染率只有17%。

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倡的卫生习惯,也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与此同时,当前推广公筷公勺、分餐进食的社会呼声再起,“舌尖上的防疫战”已引起各界高度重视,一场“餐桌革命”亟待推行。

十多年前钟南山院士发出过“餐桌革命”的呼吁,提倡在家庭中也使用公筷,这些好习惯在非典时期也一度流行,但最终因人们

的“健忘”而再次退潮。这一次,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省市都已行动起来,各地相继发布倡议书和行动方案,引导人们使用公筷公勺取餐,推行大型聚餐分餐进食。全民抗疫也是凝聚社会共识、重塑文明习惯的契机,摒弃“一双筷子吃天下”的旧习,这一次我们是认真的。

餐饮企业、单位食堂等各类经营主体均守土有责,应积极响应有关部门的倡议,当好排头兵,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标配。同时,有关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认真考虑是否可以出台具有强制性的一些举措,加强公筷公勺及分餐的推广和执行,逐步建立健康文明的餐饮和生活方式。

多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多一份放心安心。公筷、公勺用起来,分餐进食搞起来,这些文明小节将为广大市民的健康提供更全面的安全保障。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从自己做起,通过每个人的努力,让“公筷意识”深入人心,让“分餐进食”成为文明标配,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彻底打赢这场抗疫阻击战。
(樊大斌)

观察 南北

战“疫”一线上 激扬青春力量



在抗击疫情一线,有一个数字特别值得关注:在42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有12万多名是“90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00后”。

不仅是医护人员,广大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以及方方面面的抗疫一线奋斗者,也有很多是“90后”,他们成为这个战场上披坚执锐、一往无前的青春力量。

为什么人们特别关注“90后”?因为年轻人代表着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

与病魔的较量,看不见硝烟,也听不到枪炮声,但生与死的考验真真切切,危险几乎无时无刻不有、无处不在。疫情发生以来,有的医护人员倒在了抗疫一线,其中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医生夏思思今年只有29岁。而就在此时此刻,还有许多“90后”依然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以英雄的壮举,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了榜样。

这段时间,我们在抗疫一线采访了不少“90后”“00后”,他们的话让我们感动。“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也希望能出一份力”“同事们在一线勇往直前,我怎么当逃兵”……平实、质朴的话语中,蕴含着震撼人心、打动人的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火线入党,上海瑞金医院医生、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插管小分队”的“90后”小伙缪晨昊说,“并不是现在才想入党,而是这个念头一直在。”“插管小分队”是离危险最近的医护群体之一,每一次气管插管,他们都直面飞沫和病毒。缪晨昊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火线入党的“90后”,以这样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行动,践行入党的初心与誓言。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来说,参与这场抗击疫情的重大斗争,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这场重大斗争中,这些“90后”“00后”所展现出的勇敢与坚强、担当与责任,令人动容,也令人振奋。他们,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强烈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们是有远大理想的一代,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也一定是能够担当大任的一代!

艰辛与磨砺是成长最好的催化剂。参与抗击疫情的斗争,青年一代付出很多,也收获很多。收获是什么?是信念更加坚定,是胸怀更加宽广,是人生更加厚实。正如一位大学生志愿者感慨的那样,“抗击疫情是我们最好的成长礼。”
(汪晓东)

抗疫医生家中猝死 认定工伤才公道

2月13日,湖北省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医生刘文雄在家中猝死。因其并非感染新冠肺炎,同时当地人社局认为其情况与工伤认定中规定的时间、场景不合,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刘医生家属及单位提起行政复议,仙桃市政府近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原《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仙桃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决定,将刘文雄不幸身亡认定为工伤。

仙桃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无疑是一种“纠偏”。认定刘文雄医生猝死为工伤,不仅是告慰刘医生的在天之灵,而且是对其家属的应有慰藉。在某种程度上,这更是向广大仍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回顾刘医生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令人唏嘘。从1月12日至2月12日,作为医院发热门诊专家指导组副组长的他,共接诊患者3181人。“1月31日,刘文雄医生就有胸痛、心慌等身体不适症状,因防疫任务重没请假治疗。2月13日05时30分许,刘文雄在家中突发疾病并晕厥。”——这段事实描述,被清楚地写入仙桃市人社局此前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事实却不认定工伤,本身就是矛盾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处于“战时”状态,刘文雄医生接诊数量超过其他三名门诊医生接诊数量之和。超负荷的工作,给本就患有心脏病的刘医生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直到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

我们不能让英雄和他们的家属流血又流泪。特殊时期,更不能以简单的在单位或在家中,来认定有关人员去世是否属于工伤,而是要结合各种事实、因果关系、医学判断,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这是对逝者的应有尊重,也是给生者以公道和正能。
(蒋萌)

15年找回孩子 能否向人贩子索赔?

近日,广州市增城区警方公布,在智慧新警务技术的协助下,轰动一时的“梅姨”等人拐卖多名儿童一案中,申军良15年来坚持不懈寻找的被拐儿子申某终于找到了!15年等待,终于迎来了团圆,我们由衷为这家人感到高兴。而找到儿子之后,紧接着一个问题,申军良一家这些年所受到的伤害,该如何补偿?此前,在一审中,申军良夫妻向五位人贩子共主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和精神抚慰金300万元。但一审法院并未支持申军良夫妻的赔偿请求。其中一个理由是,申军良并非拐卖儿童案中的被害人,不具有主张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

首先,根据法律规定,被拐父母应具有刑法上的被害人资格。拐卖儿童案件中,除了被拐儿童是被害人外,其父母也应认定为被害人,因为父母的抚养权受到了侵害。而根据刑法,拐卖儿童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除了儿童自身的人身自由和被抚养权受到侵犯,父母对于小孩的亲权也明显受到了侵犯。所以,拐卖儿童案件中,儿童和父母应同时被列为被害人。其次,将被拐儿童父母认定为拐卖儿童案中的被害人后,父母应获得相应赔偿。父母为寻找被拐儿童,耽误了工作,并支出了差旅费,在一般侵权案件中,这些损失都被纳入侵权赔偿范围,同时还可支持亲权受损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

虽然刑法通过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方式弥补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不再另行处以经济赔偿。但刑附民案件中,除被拐儿童父母的精神损失不可不支持外,仍可支持误工费及寻子的差旅费。因此,寻人行为合法、合情、合理,司法救济缺不得,人贩子应当对被拐儿童的父母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叶竹盛)

村委会变“网课课堂” 盘活资源助推公平

据报道,3月2日,在广东省线上教育正式开学的日子,该省清远市西岸镇东江村的10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迎来了他们的“特殊课堂”。为了让村里贫困孩子上网课,作为贫困村的东江村,2月下旬就忙活起来,摸情况、买设备、拉网线,甚至把村委会会议室“拆了”,改造成教室。

疫情之下,“停课不停学”“推广网课”已成为各地平衡防疫与教学的方式。但新举措遇到了新问题:要上网课,手机、电脑、宽带都是不可或缺的设备,而不少贫困家庭一时间对此无力承担。

相比此前媒体报道的不少贫困家庭为上网课努力“自救”,东江村作为省定贫困村以其积极作为,集中盘活存量资源,为贫困学生上网课创造条件的做法更值得借鉴。同时也表明,在抹平“网课壁垒”、让网课抵达贫困生的问题上,各方包括基层组织都该“有所为”。

从该村的具体做法看,无论是提前摸排、买设备改教室,还是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提供饮食,即便对贫困村而言,这些也都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但这看似简单的扶持,具体到每一个无力承担网课的家庭与学生身上,却是解决了大难题,有雪中送炭之效。

而这对当下各地也不乏启示:解决贫困学生的网课困难,不仅要靠扶贫,也需有关各方多花些心思、多走点心——无论是盘活现有资源,还是筹措旧设备资源,因地制宜且使巧劲,可能会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基层行政部门“有心”,努力盘活现有资源;高层设计“有力”,大力扶持引入新资源,双管齐下“有所为”,贫困学生上网课难的痛点,就能更早得以消解,让线上教育公平抵达每一个孩子。
(梅堂)